

恩情重如山:廖承志回忆周恩来

编者按:周恩来与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及其后人有着深厚的友谊,他曾满怀深情地说:“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。”对此,廖仲恺与夫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也深有感触地说:“父亲早在黄埔军校就十分赏识周恩来,母亲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爱护,姐姐廖梦醒不仅和周恩来革命关系密切,而她的女儿因因又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十分疼爱的干女儿。”在回忆文章中,廖承志深情回顾了各个历史时期周恩来对他的救助、教育及关怀。

长征路上向我巧施援手

周恩来同志于1924年从巴黎回到广州,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6个筹委之一。黄埔军校成立不久便接任政治部主任,我父亲廖仲恺任校党代表。他们两人一起合作共事,常在一起。当时,周恩来同志虽然还很年轻,但卓越的领导才能已经显示出来了。

1924年,我已16岁,初秋的一天晚上,我在家门口看见一个穿着白西装的人进来,同我父亲交谈了好一会儿。他炯炯的双眸和两笔刚毅的浓眉,给我的印象很深。我问父亲:“这人是谁?”父亲说:“你还不认识他?”我说:“不认识。”父亲带着敬意说:“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!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。

1925年8月20日,我父亲遭国民党反动派暗杀,当天周恩来同志就赶到医院探望。为了彻底追查幕后策划者,周恩来同志参加了“廖案检察委员会”。他和杨匏安同志一起,积极认真地追查廖案凶手。周恩来同志还亲自审讯凶手,并写了一篇《勿忘党仇》的纪念文章,断

定暗杀是一个“很大的黑幕阴谋”。

我同周恩来同志再次见面,中间隔了10年的岁月。当时我因批评张国焘,和罗世文、朱光等同志被监禁起来。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、宁夏,到了黄河边,周恩来同志一路上打听一些同志和我的消息。最后,在往预旺堡的路上,周恩来同志碰到了我。

我看到周恩来同志心情万分激动,自广州一别,10年未和他见过面。10年前见到周恩来同志时,我还是个中学生;10年后再见面时,我已经是共产党员了,但那时却是个被张国焘“开除”了党籍的人!周恩来同志见我押送着,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也没有说话,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。当天晚上,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到司令部去。我进屋后看见一大屋子人,张国焘也在。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,却阴阳怪气地问:“你们早就认识吗?”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,却转而厉声问我:“你认识到错误了没有?”“认识深刻不深刻?”“改不改?”我都作了回答。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。吃饭时,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,也不再理我。吃过饭就叫我回去了。

周恩来同志考虑问题很周到,斗争艺术很高超,如果他不一样问我,当天晚上我就可能掉脑袋。自从周恩来同志把我叫去以后,我的待遇明显改善,不久,我就被释放了。

“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”

长征结束后,我在延安《解放》杂志社工作。周恩来同志经常在外,隔段时间就回来一次,有时就在中央礼堂作报告。1937年10月,毛泽东派我到

蒋管区工作。上海失陷了,我就奉命到了香港,在香港组织半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。1938年,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,我由香港飞到了武汉。周恩来同志明确指示我,在香港要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、新四军搞募捐工作。这样一来,海外侨胞和国外朋友捐了不少钱、医疗器械和药品、车辆等物资。这些物资,先通过广州北运,以后又通过海防转到延安去。后来,国民党不让这些物资运进来,我们只好把捐款先存起来。

1942年,我在韶关附近的乐昌被国民党逮捕。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多次向国民党抗议、交涉,要求释放,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不会有结果的。我母亲要去重庆,蒋介石也不让去。直到1946年年初,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时,敌十一战区副长官马法五、四十军副军长、参谋长等被我方俘获,我们党和国民党经过多次谈判后,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,国民党释放叶挺同志和我。1946年1月22日下午,我由重庆歌乐山顶上被押送到旧政协邵力子办公处。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释放,以为又要转移到别处继续监禁。可是不久,我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咳嗽,那是周恩来同志的声音,当时我浑身血液都沸腾起来了,激动得说不出半句话。他一进门,见到我,便同我紧紧拥抱起来。

后来组织上安排我到红岩休息了一段时间。一天,周恩来同志又来看我,对我说:“你已是‘七大’的候补中央委员了,你有一些粗线条的表现,骂过蒋介石,敢顶他,同志们选举你,但你还有不少缺点。你要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,处处要注意政治影响。”周

恩来同志又一次对我进行教育和帮助,使我对有些较清醒的认识,经常警惕自己的缺点。

经“许可”后才进病房探望我

新中国成立后,我和周总理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。他对我要求很严格,对我的缺点和错误,有时当面向我指出,有时在有关同志面前对我作严肃批评。我每想到他对我的批评教育,内心就充满感激。

周总理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关心同志。1970年冬,我心脏病发作,周总理在百忙中安排我到北京医院住院治疗,在得知我病情恶化时,又亲自到医院来看我。总理到了医院,没有径直到我的病房来,而是先把我的爱人经普椿同志叫出去,问她:“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?我去看他会不会使他心情激动?会不会加重他的病情?”当经普椿感动得含着热泪请他进病房时,他才进来看我。

周总理这样关怀同志,却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特殊的照顾。1955年万隆会议时大家住在大使馆,周总理的工作十分紧张、劳累,当时的驻印尼大使黄镇同志想多搞一点菜,让周总理吃好一点,他都表示反对。1974年,周总理住院治疗,我几次陪日本朋友去看他,见他一次比一次显著地消瘦了,我心里很难过,使劲忍着眼泪。我们离开时,周总理还亲自送外宾出来,我见他走路已很困难了,想去扶他,总理不让扶,要自己走。周总理很不愿意我们把他当病人看待。

据《周恩来交往纪实》于俊道/主编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)

林徽因改名背后的公案

众所周知,林徽因是著名的建筑学家,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,但鲜为人知的是“林徽因”并非她的本名,她原本叫“林徽音”。而林徽因的改名,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。

现代文学史上,有两个极其相近的名字:林徽音和林徽音。前者是知名才女,后者是一位男性海派作家。二人都是真名实姓,名字只有一字之差,且“徽”和“微”的字形又极其相似。更加巧合的是,二人的风格也比较接近。林徽音(女)是新月派诗人,林徽音(男)则和新月派过从甚密,甚至一度被邵洵美委任做新月书店的经理(有学者认为林徽音同样属于新月派)。

林徽音的改名,显然和男性作家林徽音有关。但改名的具体原因,是一桩公案。影响最大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看的:林徽音的作品格调低下,有很多情色描写,堪比流氓文人。林徽因鄙视其作品和为人,怕别人把他的作品当作自己的,于是改名自保。

其实,只要读过林徽音的作品,就知道这种说法并不靠谱。林徽音的作品中固然不乏情色描写,但在纯文学的范围之内。至于林徽音的文学水平,尽管最后没有实现什么大的文学成就,但其奉行唯美主义,文化界是认可的。

林徽因本人则没有留下文字来说明自己改名的深层原因。关于她的

改名,有几个事实是可以确认的。一、林徽因没有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声明公布改名之事。二、林徽因的改名是渐进式的,从1934年开始一点点改,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完全替代成“林徽因”。三、改名更多地局限在公开发表的作品上,私生活的一些方面:(如个人的名片)上仍用“徽音”,朋友写信称“徽音”,她也不会纠正,说明两个名字是共用的。

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,林徽因对改名并不是十分重视,改名可能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:在作品上和林徽音区别出来。林徽因有才气,有傲气,也有不可超越的阶级属性。有才气,所以她可能不喜欢林徽音的文风;有傲气,所以她宁愿自己改名;有不可超越的阶级属性,所以她不会和林徽音纠缠,自己悄悄地改名完事。

至于为何改名“因”字,学者陈学勇先生已经考证过了。林徽因改名时想取个“音”的同音字,其弟林暄说有个女同学的名字里有个“因”字,给了林徽因启发。

说回到林徽音,在考证之后我们发现,他更像是一位无辜的受害者。因为林徽因“光芒万丈”,处在对立面的林徽音被流言扣上了“流氓文人”的帽子。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人,没有显赫的家世,也没有冲天的才气。林徽音有自己的理想,愿意为之努力,也曾取得过小小的成就,他不应该被误解。①

据《各界》于壮/文

